联合国 A/S-30/PV.3

大 会
第三十届特别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丹麦)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卡迪先生（意大利）主持会议。

上午10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7（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新加坡共和国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先生阁下发言。

尚穆根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新加坡高兴地参加本届大会特别会议。

要讨论全球毒品问题，我们就需要首先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人民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想为人民带来同样的东西—和平、繁荣、进步、机会平等以及良好的生活质量。安全与安保是任何社会的基石，如果没有它们，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背景下，问题如下：毒品对我们大家想要的那种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社区中的药物滥用问题？什么是最佳做法？在2019年特别会议到来之前的今后三年中，我们将需要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

由于多种因素，我们现正处在交叉路口。各国努力打击毒品祸患，但却并不成功。其成千上万公民丧生，其社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为毒枭所控制。一些国家尚未受到根本性影响，其毒品局势普遍处于控制之下，该问题被控制在人口的某些群体范围内。对于处于这种局势的国家来说，在其社会中接受毒品似乎具有吸引力。因此，这些国家寻求减少危害，或者实际上是合法化。其它国家，如新加坡则侧重于通过减少供给来处理贩毒，并通过减少需求来打击毒品滥用。

当我们沿着这条减少危害的道路走下去时，我想，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毒品危害滥用者、其家庭以及社区。我们来自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对一段时期内的期刊文章进行了文献评述。他们研究了来自信誉良好的医学刊物的500多篇文章，而证据确凿：大麻是有害的。它可给大脑和认知能力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它令人上瘾。每10名定期使用者中就有1人上瘾，而对于日常使用者来说，这个数字则增加到每2人中就有1人上瘾。昨天我听到很多关于基于科学的禁毒做法的发言。我刚才说的就是“基于科学”的。毒品危害我们。我们不会明知如此却欣然把毒品交给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对不对？如果他们滥用毒品，我们可能接受这种情况并且加以处理，但是我们不会自愿给他们提供毒品。因此，让我们明白毒品的有害影响。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处于一个困难的环境。我们的附近有多个主要毒品生产中心。我们认为，毒品将摧毁我们的社会。考虑到每年2亿多人经由我国边界旅行，以及新加坡所拥有的购买力，软性做法将意味着，毒品将在我国泛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一种综合、均衡、持续以及强硬的做法来处理供需两端。结果不言自明。我们已相对消除毒品，毒品局势受到控制。没有毒品避风港，没有禁区，没有毒品生产中心，也没有针具交换计划。我们在毒品问题上的姿态使我们得以为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新加坡。

昨天，我在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上听到许多发言，大力宣扬民众获取麻醉品的权利。这种论调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出现，即一方面是人权与尊严，另一方面则是压制。也许这种言论的依据是某些国家的经验，但是在我们听来，它却很像站不住脚的稻草人论调，因为它没有以事实为依据。

减少需求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情或不顾及滥用者。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把滥用者关起来并扔掉钥匙，判其终生有罪。在严厉打击贩运者、严格预防以及强硬处理毒品滥用者的同时，从心理、医疗以及经济上帮助滥用者而不为其提供毒品是有可能的。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戒掉这个习惯并重新融入社会是有可能的。

我们对滥用者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对于首次和第二次涉毒的年轻人，我们侧重于心理咨询。我们不拘留他们。我们把他们纳入一种框架，帮助他们戒毒，找到工作，并且重新融入社会。大量的侧重点被放在与他们一道努力并且帮助他们上。这是把所有人关起来、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他们和为其提供毒品的备选做法这两者之间的折衷道路。折衷道路旨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些人身上，帮助他们戒毒。有时，生硬的做法是必要的。有时，拘留是必要的，但是并非总是如此。要进行评估，并且相信人类潜在的尊严会戒掉毒瘾，过上无犯罪的生活。为他们提供毒品较容易。真正对他们展开工作，努力帮助他们脱瘾恢复，则较为困难、需要更多精力，并且需要更多资源。这正是我们在设法做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逮捕6000多名吸毒者，而现在的人数是3000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背景是新加坡更加繁荣，人们有更多的钱来购买毒品，而且区域毒品形势在不断恶化，毒品供应大幅增加。我们实际上把吸毒者人数减少了一半。这意味着，我们每年使3000人免遭毒品祸害。我们的复吸率也从60%下降到了30%。

让我们也明确一下毒品对犯罪产生的影响。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在新加坡，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犯罪和犯罪人员的情况，就会发现，它们要么与毒品有关联，要么有与毒品相关的前科。

我们如何保护毒品的受害者？我看到许多人在谈吸毒者的权利，但是，受害者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们？我们要不要谈一谈由于母亲吸毒，出生就有毒瘾的婴儿？他们还是婴儿，就已经依赖毒品了。

在新加坡，我们需要为自己作决定的权利，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安全地行走，十岁女孩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女士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出门——如果你晚上开车兜风，可以看到女性穿着短裤，锻炼身体。这些都是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权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禁毒斗争取得了成功。

我们散发了有关新加坡的一些统计数据，以便为大家提供背景情况，说明为什么我们珍惜我们取得的成就，为什么我们不准备放弃这一切。假如有人可以提供证据，向我们展示毒品对吸毒者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而且犯罪形势不会恶化，社会中其他成员也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对空谈不感兴趣。说漂亮话是一回事，而享受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安全和保障——让十岁儿童自己乘坐公共交通——是另一回事。我要对任何有不同看法的人说：你们可以来找我。我愿意拿我们的经验与你们选择的任何城市作

比较。让我看看有什么模式可以更行之有效，并且给公民带来更好的结果，我们会考虑改变做法。如若不然，那请不要要求我们作出改变。

从现在起到2019年，在我们作为全球社会，如何向前迈进以便解决毒品问题方面，我们必须达成协商一致。每一个国家都应有权选择对它们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对我们来说，选择是明确的：我们想要一个没有毒品的新加坡，而不是一个容忍毒品的新加坡。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没有毒品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一员，这个愿望来自我们这个已建国50多年的国家，我们目前在法制指数方面位居东盟第一，在最佳出生地指数方面，我们名列世界前五，在生活质量以及社会成就、教育和保健指数方面，我们也在前五之列。如果其他人想要我改变，那么他们必须告诉我什么办法更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丹麦王国卫生大臣苏菲·勒德女士阁下发言。

勒德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我谨提及欧盟委员会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所作的发言（见A/S-30/PV.1），丹麦政府完全支持他的发言。

丹麦政府欢迎会员国有这个机会审查《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自该文件于2009年通过以来，我们取得了进展。但是，毒品问题继续对吸毒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构成挑战。请允许我谈几点意见，它们是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关键所在。

毒品政策应做到平衡。只靠禁止和管控是不够的。在减少毒品供应的同时，应着力把重点放在循证预防、治疗和减少伤害措施上，包括减少与毒品相关的死亡。我们必须铭记，毒品政策总的目标是保障人的健康和福祉，并且解决滥用药物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伤害。

有鉴于此，丹麦实行了减少伤害措施，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我们毒品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采用这一做法是基于我们坚信，毒品政策应建立在人权基础上。每个人，包括吸毒者，都有权获得有尊严的对待。因此，丹麦政府深感遗憾的是，《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没有解决取消对涉毒犯罪的死刑刑罚这个问题。丹麦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适用死刑。为取得进一步进展，让民间社会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参与制定毒品政策也至关重要。

尽管我们携手作出了努力，但我们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以及滥用药物造成的巨大伤害。在民间社会的参与下制订并执行以人权为基础，平衡和有据可依的毒品政策，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所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卫生部长简·菲尔波特女士阁下发言。

菲尔波特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

几周前，在为本次会议作准备时，我与几个非政府组织在渥太华见了面。他们当中有律师、医生和能言善辩的活动人士，但是，其中最有力的声音来自一位母亲。她在会面时讲述了她年轻女儿的遭遇，她的女儿因滥用药物造成并发症而丧命。她讲到，她看着女儿因苦于无法获得治疗和服务慢慢死去，而这些治疗和服务本来是应该提供的，以便拯救一个美丽、脆弱的生命。这样的事情太司空见惯了。有无数人由于过量使用合法和非法药物而骤然死亡。

今天，我作为加拿大卫生部长站在大会面前，承认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公民做更好的工作。我要自豪地捍卫我们的毒品政策，这项政策以坚实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并且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力求尽可能扩大宣传，把伤害降至最低程度。

我曾经在加拿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当过医生，我看到太多人因毒品、毒品相关犯罪以及考虑不周的毒品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受苦。所幸的是，解决办法就在我们手中。

在我国，“Insite”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有监管的吸食毒者网站，成瘾者能够在这个网站上获得他们需要的护理和支持。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正在十分迅速地提供纳洛酮解毒药包，使人们不致因吸毒过量而丧命。

（以法语发言）

我认为，我们当前亟需共同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对大城市和偏远土著居民社区来说都应如此。

我知道国际上也存在着善意。事实上，我感到振奋的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最近提醒我们，必须把健康和福利置于执行条约的平衡方法的核心位置。

（以英语发言）

我们必须对毒品问题采取全面、协作性和有同情心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促进共同责任的同时必须尊重人权。它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

我们加拿大将会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大麻。为此，我们将在2017年春天提出立法，确保不让儿童获得大麻，并不让犯罪分子获得利润。虽然该计划对许多国家的现状提出挑战，但我们相信，这是保护我们的青年并同时增强公众安全的最佳途径。

加拿大将继续实现其毒品政策方针的现代化。我们将在工作中提倡上游预防、同情治疗和减少伤害。我们将与执法伙伴一道努力，鼓励采取适当和相称的刑事司法措施。我们知道不可能光靠逮捕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棘手的吸毒问题是一个共同挑战。解决办法也是由各国政府、土著人民、民间社会、青年、科学家和各联合国主要机构参与的集体努力。

我承认，其他国家和文化将会采用与加拿大不同的方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尊重彼此的观点并寻求共识，我们就能够实现保护我们公民的共同目标。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哈马联邦国家安全部长伯纳德·诺蒂奇先生阁下发言。

诺蒂奇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巴哈马感谢有机会参加大会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本届特别会议，因为我们支持携手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尤其是巴哈马面临的安全挑战。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各方的决心是大会讨论的基础，以便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应对毒品问题。

40多年来，由于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毒品问题以及我们致力于采取国家行动以及在该领域中进行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巴哈马处于毒品管制的前线。我国地处中南美洲和加勒比非法毒品生产中心到北美和欧洲途中的战略要地。我国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群岛，有漫长的水上边界和数百个没有永久居民的岛屿。

区域中生产的招牌毒品可卡因和大麻，也是进入和通过巴哈马过境贩运的主要毒品。包括巴哈马人在内的跨国犯罪分子联盟继续利用各种船只，包括近海货船和快艇，主要通过我国的海域贩运毒品。

巴哈马当前的国家安全问题与非法毒品贸易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请允许我特别提到我们在武器贩运、人口走私、非法移徙和贩运人口方面的严重挑战。这些非法活动——特别是武器贩运这个毒品贸易的明确分支——倾向于依赖毒品贩运的平台。结果，现在一次贩运活动可能涉及毒品、枪支和非法移民。

尤其是非法武器的引进大大增加了我国安全局势的复杂性。枪支已经成为暴力犯罪的首选武器。但是，我们下决心不让毒品贩运、犯罪及犯罪活动来破坏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在此背景下，并参照《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巴哈马目前的毒品政策注重在传统执法方法与替代性发展方案、包括公共卫生方法之间的适当平衡。

1983年成立了叫作OPBAT的“巴哈马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行动”，它是一个多机构的国际缉毒努力，注重制止非法毒品从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流向巴哈马、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和美国。迄今为止，估计OPBAT把通过巴哈马进入美国的可卡因流量从80%减少到10%，并且被认为是区域中最成功的禁毒执法举措之一。

巴哈马将要启动一个价值2000万美元的公民安全与正义方案。其主要目标是罪犯的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包括那些因涉毒罪行正在服刑的人。国家禁毒秘书处是我国所有禁毒工作的协调机构，它从事药物使用和滥用的调查研究，以指导新的政策重点。巴哈马还预计成立毒品治疗法庭，以便通过治疗和康复，为吸毒上瘾罪犯提供监禁以外的出路。

由于青年不成比例地成为涉毒罪行和暴力的受害者和犯罪者，巴哈马已开始执行一系列注重高风险青年的举措。例如，我们最近设立了一个全国无毒品学校日，在这一天里学生、老师和家长一道创造一个无毒品的积极的学习环境。我们已经开始通过“国际毒瘾专业人员认证和教育中心”为所有校警和督导员提供预防毒品培训。

我们期待着在国际禁毒努力中发挥新的领导作用。在去年11月于秘鲁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美洲药管会）第五十八届常会上，巴哈马获选担任副主席职务——这是我们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我们期待着11月在我们美丽的国家主持美洲药管会有意义和富有成效的第六十届常会。

当我们开始为2030年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议程和标准时，我们期待着加强有关国际安全的全球努力，以对抗那些威胁要破坏我国稳定的挑战。我保证，在有效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进程中，巴哈马是一个乐意和坚定的伙伴。巴哈马将不遗余力地在我们边界内外促进和平社会与遵守法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共和国卫生部长达里奥·纳季齐先生阁下发言。

纳季齐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赞扬麻醉药品委员会秘书处和本届特别会议理事会为这次非常重要活动的筹备进程投入了大量努力。本届会议使我们有机会广泛讨论同我们目前在全球各地面临的毒品问题有关的政策问题，并重新思考我们的方针和目标。

我们必须公开指出，目前的禁毒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结果，因而不能不加修改地继续下去。现在应当转变观念，而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禁毒政策改革。

仅从惩罚和惩罚性层面这一角度出发来处理全球毒品问题显然会对健康和人权产生消极影响，使处理问题的办法比问题本身还糟糕。铭记这一点，克罗地亚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死刑，包括不支持对有关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我们重申，死刑损害人的尊严，同时起不到威慑犯罪行为的作用。

我们将毒品问题作为公共安全问题对待，我们必须同样程度地将毒品问题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对待。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钻牛角尖。毒品现象贯穿许多学科，因而必须从多学科角度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这是确保卫生、社会和司法等方面政策协调一致的唯一途径。

最大关切问题之一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迅速流行。我们必须在现有预防方案框架内提高对使用此类新物质风险的认识。随处可见的使用复方物质的趋势往往涉及合法物质与非法物质同时使用。这促使我们注重采取综合禁毒政策，这种政策还应涉及范围广泛的其他成瘾行为。让我简要阐述对克罗地亚共和国来说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

近些年，克罗地亚共和国持续努力，在考虑到全球禁毒政策向基于证据的方针转变的情况下加强本国禁毒政策。作为成本评估进程的一部分，我们还建立了一些指标和工具来评估在国家层面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成本效益比率。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世界许多区域，注射毒品人员中间的血源性疾病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克罗地亚共和国有开展减少风险和伤害方案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导致注射毒品人员中间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很低——低于1%，同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已从二十一世纪初顶峰期的71%降至2014年的25%。这些措施还促成同毒品有关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并促进总体公共卫生。

克罗地亚共和国坚定致力于帮助吸毒者重返社会。在我们2007年获得核可的帮助重返社会项目框架内，我们正在运用各种社会干预措施，从心理社会支助到以教育、就业和住房等形式提供的援助，不胜枚举。这一项目减少了同吸毒有关联的污名，并促使众多吸毒者参加再教育方案。最终结果是，吸毒者的就业率有所增加。

我们努力推动吸毒者从吸毒成瘾状态中恢复过来，将此作为我们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方案都是在同民间社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开展的。在我们改善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吸毒者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努力中，民间社会组织提供了诸多支助。它们通过在决策进程中提出建议作出的贡献有着巨大价值。它们在执行阶段被视为平等伙伴。

回到全球层面，我非常欢迎本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这项文件证明，会员国尽管国家禁毒政策千差万别，但仍可能通过建设性对话在制定全球禁毒政策方面达成协议。

我援引圣雄甘地说过的一句话来作结：

> “我们做什么与我们能够做什么，两者之间的差别足可解决世界多数问题。”

我坚信，在建设性对话基础上，我们将成功地充分发挥我们的全部潜力，弥合我们在国家禁毒政策方面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两者之间的距离。这将使我们能够切实推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最后，让我以克罗地亚大诗人阿里屯·居斯塔夫·马托斯的话来结束发言：

> “最难的是独自而处，发现自我。”

因此，让我们帮助他们发现自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伊曼纽尔·卡巴拉斯先生发言。

卡巴拉斯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祝大家上午吉祥。菲律宾代表团祝贺哈立德 •沙马大使当选为本届特别会议理事会主席。我们知道，在他主持下，这三天能够取得许多成果。

在菲律宾国内，我们再次处于政治变革关口上。再过不到三个星期，我们将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将对今后六年政府政策和国家方向有着直接影响。尽管如此，我国打赢禁止非法毒品这场战争的意愿依然坚定不移。同其他会员国一道，我们仍然致力于在一项综合和平衡的战略指导下进行这场战争。在这方面，我们要正式指出我们的承诺所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我国所有针对被禁止药品的地方和国家政策、举措和努力都完全符合三项国际禁毒公约。第二，正如我们在3月份于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发言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仍然坚定和坚决反对所有要求使被控制药品合法化的呼吁。我们今天在此无条件地重申该发言。第三，菲律宾不支持对同毒品有关的犯罪或这方面的任何其他刑事犯罪实施死刑。

我们高兴地报告在我们同世界毒品问题持续作战中取得的有意义进展。人们注意到，过去12年，由于我们执法机构采取凌厉措施，被禁止药品的需求和供给均大为减少。在学校和当地社区更经常开展的重点更突出的宣传运动同样卓有成效。在青年尤其易受毒品危害的社会基层做出这种努力，不仅提高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总体认识，而且还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体会。

此外，我国政府继续敦促流离失所者改行从事合法谋生活动，例如种植马尼拉麻和养蚕产丝。我们还采取同情办法帮助吸毒者治疗和康复，目标是使他们最终重返主流社会。这些都是现有国家禁毒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一直执行到2020年。

我们确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不断演变。许多挑战迫在眉睫，包括出现毒品政治，出现外国贩运集团，新药品和被禁止物质的威胁经久不息，等等。的确，计划再好也将行之无效，除非所有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付这个敌人。各代表团踊跃参加本届特别会议，说明我们全球社会尽管看似各自做法不同，但将取得胜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共和国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苏珊娜·玛贝尔·马尔科拉女士阁下发言。

马尔科拉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提及过去几天阿根廷发生的一起惨痛悲剧，导致我改变我今天的发言。上周六凌晨，在一场电子音乐会上，有五个年轻人因食用合成药物而死亡，另有五人情况严重，迄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这起不幸事件的发生对阿根廷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打击，清楚地说明毒品祸害如何毫无区别地影响所有国家和所有人，葬送青年的潜力和未来，并且对我们家庭和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本届特别会议必须成为我们重申和加倍我们的政治承诺，以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在此讲台上，我们谨向受此次悲剧影响的年轻人的家人和亲人再次表达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他们不幸增列到全世界毒品问题无数受害者名单。

在产生由毛里西奥·马克里总统领导的政府的选举过程中，确定了以下三点为政府工作重点：消除贫穷、打击贩毒活动，以及阿根廷人在民主体制化范围内团结一致。马克里总统在2015年12月10日上任时确认了这三大支柱。新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承认阿根廷在世界毒品问题中面对严峻局势。承认问题的存在，使我们能够寻求和实现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承认我们面对一个不分国界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主张，以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原则为指导开展合作是优先事项，以进行集体协调努力和承担责任。因此，我们积极推进合作，交流信息，在双边、区域、半球及国际层面，以及在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各专门机构内协调行动。

在国际层面，这些行动意味着阿根廷应依照我国始终坚持的原则和价值观，再次发挥我国在历史上一贯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我们提倡采取全面应对办法，在限制供应（打击非法贩毒）与减少需求（预防与护理）两者之间求得平衡。

在供方应面，我们在合作、培训以及交流信息与情报方面推动协调行动，旨在切断毒品贩运链；防止挪用或通过隐蔽渠道获取受管制物质和前体；以及打击其它相关罪行，如贩运武器、腐败及洗钱活动。如果不解决资金链问题，我们将永远无法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

关于需求，我们牢记，最终目标是把人放在我们禁毒政策的核心。我们主张把核心重点从物转向人，把人作为权利的主体，同时促进社会包容，以此作为核心要素和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的目标。我们的观点立足于关注与护理、吸毒者治疗与康复，同时促进消除歧视和污蔑态度。在所有情况下，上述方法必须以科学证据为根据，并有助于实现最终目标：人类和个人的健康与福祉。

人权——即各项国际公约确认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最高标准——是阿根廷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立场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家政策中，我们采用性别平等的观点，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的具体做法。而且必须如此，因为对阿根廷而言，只有呼吁团结，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些价值观，这也是我在发言开头提到的马克里总统政府的另一条轴线，是我们作为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国际和区域系统一部分的

特征。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走的道路，是我们在世界毒品问题方面必须采取的国家人权政策，即促进共存，消除偏见、污蔑及歧视。

关于人权，我还要指出，阿根廷没有死刑。因此，我们强烈支持废除死刑。

阿根廷从一开始就参与召开本届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的工作。我们认为本届会议是一次认真、诚实地评估现行世界禁毒政策的进展与挫折、成就与失败，以及挑战与障碍的独特机会。我们承认，已经展开了一场广泛、富有成效、无拘无束的辩论。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坚定不移地参与了建立共识的进程，导致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于昨天获得通过。我们非常欢迎所达成的高度谅解和共识，即人权是处理和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与不可分割地因素。为此，我们欢迎不仅在成果文件中、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肯定该问题的适切性。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各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的充分执行，并且在充分履行相关人权义务的情况下这样做。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希望在处理使我们今天汇聚一堂的这个问题的各种方案、战略以及政策时，推动保护并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尊严。

正如一开始所阐述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对世界毒品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国际合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成果文件体现出，我们在处理当前面临的这个祸患的各个层面时，存在开展这种合作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深化国际合作，并且提高国家的能力。为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广泛、平衡以及多学科的做法，同时重申共同与分担责任的原则，并且认识到该现象的全球跨界影响在与日俱增。

从谈判一开始，我们就申明，2016年特别会议的主要结果之一应该是就用于医学和科学用途的受管制物质的获取渠道达成普遍共识。我们欣见，成果文件依照联合国各项禁毒公约，反映出这种关切。这一事实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承诺，我们必须强化这种承诺并且加以补充，同时确保对受管制物质和基本药物清单进行定期审查。这是我们能够商定基于科学证据、着眼于实现各项公约目标的国际协调一致清单的唯一方式，从而支持各国就清单列名做出决策。

根据成果文件中所商定的内容，我们强调必需提高国家的能力，以发现并查明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并且制订应对该问题的具体政策。我在本次发言一开始就痛心疾首提到的就是这些物质。同样，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期减少把因特网用作推销、非法销售以及贩运毒品等非法用途。

阿根廷强调，必需继续加强那些专门处理世界毒品各方面问题的全球和区域性机构以及政治和技术机构。我们呼吁加大那些直接或间接负责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联合国相关机构间联合工作的力度。

自我们上次即1998年召开有关该议题的特别会议以来，已过去近二十年。也许这次的主要经验教训是：我们本不应等待如此长的时间之后再来处理这样一个任何国家或区域都无法幸免的问题。2016年的本次特别会议和2019年之前与之后的时期为加强和大幅扩大合作与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在迎头痛击毒品贩运问题的斗争中，制订基于科学和科学证据的禁毒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的核心必须是一视同人地尊重个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外长Mikheil Janelidze先生阁下发言。

Janelidze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表示，我国政府感谢召开本届特别会议，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机会肯定已取得的进展，并且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集体努力，有效地处理世界毒品问题。

我们欣见《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取得了切实成果。加紧努力以有效应对世界毒品问题与成功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两者彼

此紧密关联，并且是相辅相成的。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在世界各地推动实现无药物滥用社会方面仍面临障碍。尽管我们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世界毒品问题继续给全球各地民众的健康、安全以及福祉带来挑战。

我想着重介绍格鲁吉亚出现的一些新的重大情况，其目的是确保开展有效的决策和干预来打击药物滥用和其它毒品相关活动。格鲁吉亚政府充分肯定有必要制订一种符合国际法、三项毒品管制国际公约以及相关国际标准的全面做法。

在国家一级，打击毒品战略和随后的行动计划是我们本国努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战略是根据人权标准，基于对我国国情的分析而制订的。它涵盖了四个主要部分：减少需求与有害性，减少供给，监测国内毒品局势，以及协调政府间活动并与各种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

格鲁吉亚为此采取了多种体制性步骤。2011年11月以来，禁止滥用药物机构间协调理事会制订并协调缉毒政策，并且对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执行进行修订与监测。2015年成立的全国毒品监测中心是收集和分析格鲁吉亚毒品形势信息的一个有效机制，它推出了基于证据的科学而实用的方法。

作为全面和均衡做法的一部分，2015年修订了刑法，以区分拥有毒品与分销毒品两者的刑事责任。对拥有毒品的处罚有所减少，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拥有毒品案件中所采用的是非监禁性惩罚措施。格鲁吉亚还建立了一个早期干预、治疗、康复以及重返社会的全国综合机制。降低毒品所造成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取消紧急情况下对病人的限制因素，即：医务人员不再有义务向执法机构告知吸毒过量的情况。2014年以来，我们为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提供了替代治疗方案。

最近，我国核准了更新后的2016-2018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国家战略，强调我国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主要方向是至迟到2020年稳定艾滋病毒流行态势，并在2030年前消除这一病毒。我国政府正在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消灭丙肝方案。为了进行前期诊断和治疗监测，我们为病人提供必要检测，并且为他们提供最新的丙肝治疗药物。作为二级预防措施，我们创办了社会企业，雇佣过去的吸毒人员，通过工作为他们提供康复机会，由此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根据这项国家禁毒政策，我们制定了具体措施，通过教育公众和提高意识来开展初级预防。2014年，我们发起了规模宏大的禁毒宣传活动，以便提高人们对于药物滥用风险的认识，并且在民众中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我们面前的挑战突出表明，必须加强合作和伙伴关系，以便作出协调应对。格鲁吉亚致力于加强与整个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机构的合作，以便成功应对药物滥用造成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长拉赫马尼•法兹里先生阁下发言。

法兹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波斯语发言，口译由代表团提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少数几个蒙受了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但仍努力阻止了大量毒品落入致人死亡的贩毒者的手中，从而保护了全球社会的一部分免受邪恶的毒瘾之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展了广泛活动，在我们不懈打击非法药物，与区域和跨区域武装贩毒人员斗争的过程中，有3800多人献出生命，12000人受伤。我们耗资几十亿美元为边境地区配备设施，并在边界沿线建立实体屏障，以便阻止毒品流入我国，并且遏制毒品流向其它国家。通过这样做，平均而言，全世界80%的鸦片和约40%的海洛因和吗啡是在伊朗截获的。2015年，伊朗截获了约620吨不同类型的毒品。

与此同时，为了执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制定的指导方针，对麻醉药品和毒瘾问题给予特别重视，把它们作为我国减轻危害社会方案的重中之重，我们在减少供应和需求平衡战略的框架中坚定执行了减少毒品需求方案，包括预防、治疗、减轻危害、脱瘾康复以及重返社会。

这是我国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通过针对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场所以及社区的预防方案，覆盖了全国40%的人口。我们达到有40%的成瘾者和吸毒者自愿转诊到减轻危害中心和治疗诊所，这个数字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之一。鲁哈尼总统的政府通过了一项基于社区的办法，这一做法提倡希望和审慎判断，并且呼吁尽量扩大公众的参与。根据这一原则，85%的减少毒品需求方案由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来执行，其中包括预防、治疗、减轻危害以及社会支助。

我们还采取了新办法，通过提供医疗保险、治疗后服务、职业培训和就业来保护已戒毒人员和正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我们还采取措施，通过对涉毒犯罪人员判处其它刑罚，力争减少监狱犯人的数量，并在监狱中提供减轻危害和治疗服务。此外，通过制定减轻危害干预措施，我们把注射吸毒者中的艾滋病毒传播率减少了6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平衡和综合的减少毒品需求和供应战略，通过扩大区域和国际合作，特别是真正落实集体和国际共担责任，不作任何政治考量的原则，同时避免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提出毫无必要的议题，我们将在不远的未来看到全球禁毒斗争取得成果。

作为一个站在打击非法药物前线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必须坚持把三项国际禁毒公约作为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基石，因为这几项公约全面，并且灵活。同时，必须支持麻醉药品委员会，它是联合国在与毒品相关问题方面的主要政策制订机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支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合法获得镇定药物和满足科研需求提供便利。作为联合国的执行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禁毒办)必须得到加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特别重视替代生计，以求减少对毒品贩运、毒品生产以及毒品相关犯罪的依赖，可以大力扫除麻醉品祸患。这就需要在全球社会参与下打击非法种植，并且铲除非法作物，以便在易于遭受毒品种植、麻醉品贩运或吸毒影响的区域执行替代发展方案。

在平衡和综合战略框架内，我要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愿意主办一次国际会议，讨论打击巴尔干沿线麻醉药品及毒品相关犯罪问题。通过与禁毒办以及过境沿线国家协作，会议将研究如何加强合作，以便打击这条线路上的与毒品相关的洗钱活动——估计金额约为300亿美元——同时探讨是否有可能开展受控交货行动，以便找到毒品贩运集团头目，截获运毒车辆，并且分享经验。

我们已经把2019年确定为实现全球社会这些目标的期限，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把下述建议纳入下一次会议的议程：采取基于社区的办法，并且通过一项保护已戒毒者、正在接受治疗吸毒者及其家人的计划，因为这一措施是成功的；必须研究如何加强巩固已戒毒者的戒毒成果；必须采用新办法，通过发展区域和国际合作来有效查缉毒品相关犯罪；国际社会必须兑现为过境国提供设备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社会必须执行替代发展方案，由此把重点放在从源头和生产地区控制毒品上，并在共担责任原则基础上，把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事项。

在这方面，我要再次表示，我国愿意执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及禁毒办达成的协议，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下，在阿富汗的一个省份执行替代发展试点项目。

最后，我希望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将在考虑到该领域中的成就和挑战的情况下，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以及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实现集体意愿并使国际社会能够参与打击世界毒品问题，为实现《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规定的目标作好有利的准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耳他家庭和社会团结部长迈克尔·法鲁贾先生阁下发言。

法鲁贾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有机会在大会介绍我们的毒品管制经验以及我们在打

击滥用麻醉药品方面所通过的决议，确实是一大荣誉。

人们为什么会对毒品或者说任何其他物质上瘾？是因为缺乏意志力还是缺乏道德原则？是因为他们从毒瘾中获得刺激？也许吧，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更为复杂。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的疾病，戒毒光靠善意或坚强意志是不够的。毒品改变了大脑，使之有利于强迫性吸毒。戒毒容易吗？不尽然。即便对准备戒毒的人而言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并可能遭遇失败的巨大挑战。

不幸的是，复发太常见了。让吸毒成瘾者重新站起来需要耐心和毅力。为此原因，受害者需要帮助、支持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治疗，以帮助他们战胜这一疾病。吸毒成瘾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科学进步，我们对毒品如何对大脑产生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知道能够成功治疗毒瘾，从而帮助人们停止滥用毒品并过上有所作为的生活。

我们坚信，要击败这一残忍的恶习，真正的毒品受害者需要得到帮助——不是法院判刑。根据马耳他2014年7月7日公布的关于毒品除罪化的法律草案，吸毒者不再面对法院判决，而是面对司法专员，并且如有必要，将面对由专家组成的社会委员会。重复罪犯将被提交一个毒品罪犯康复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的负责人是欧洲人权法院的一名前任法官。该委员会有权发出强制性康复命令。重点更加侧重康复和护理。

截至今年，任何被发现拥有最多2克海洛因、可卡因或2粒摇头丸或任何类似物质的人将只受到罚款。拥有3.5克或以下数量大麻的人受到同样处理。我们在社交使用者、街头贩卖者和毒枭之间作出非常明确的区分。不允许贩卖者和毒枭的存在——他们理应受到应有的处罚和相应的判刑。我肯定不是在谈论死刑。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一字不提取消死刑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在减少伤害方面，我们的重点是现在需要为将来作准备：处理人的不同层面，包括身体、社会法律、心理和精神方面；并通过与接受服务者进行积极、相互依存的沟通，寻求了解具有严重毒品问题的患者的真正和首要需求。我们正在执行下列方案。

第一，20年来，作为一项减少伤害的措施，我们一直向吸毒者分发免费注射器。我们已经取得积极成果，共用针头只造成4例艾滋病毒感染、15例丙肝和1例乙肝。

第二，我们政府各机构免费提供康复计划，并且我们通过与获得委任的非政府组织订立的服务协议，资助其他康复计划。我们也为所有其他类型瘾疾提供免费服务。今后几个月里，我们将首次在马耳他推出针对双重诊断的成年和未成年患者的康复计划，这些人虽然不使用毒品，但没有替代药品就无法生活。

第三，我们以整体的方式处理受害者、其家庭和周围环境，大力强调为康复后调养作准备，同时采取强化方法进行后续护理。此外，我们在社区中心制定了消除贫困战略，因为我们了解，许多吸毒成瘾者最终失去工作，导致他们无家可归。在多部门小组的帮助下和一位社会辅导员的监督下，我们专门设计和支持了就业机会，戒毒者在那里受到培训和获得技能，一位就业教练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劳力市场。

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半路住宅方案，根据该方案我们资助头三年的房租，第一年为65%，第二年为50%，第三和最后一年是25%，希望这些脆弱人士能够在生活中做到180度大转弯——从我们福利和卫生系统的负担改变为我国经济的贡献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纳·约翰逊·史密斯女士阁下发言。

史密斯女士（牙买加）（*以英语发言*）：牙买加欢迎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在我们评估我们迄今

为止的努力时，我们赞赏有机会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和一道工作。

世界毒品问题的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在遵守法治的同时，制定了辅助我们发展目标的积极应对政策。迫切需要制定并执行平衡、多层面和创新的战略。鉴于非法毒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牙买加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努力，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我们正在预防、早期干预、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领域中完成一项五年全国毒品计划并制定全面的减少需求方案。我们已经加强了旨在捣毁犯罪组织、防止洗钱和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

在制定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政策时，我们认识到不存在一刀切的办法。在牙买加，大麻传统上被用作民间草药，是我们本土信仰拉斯塔法里教信徒的宗教圣礼。此类具体用途同为贸易而进行的非法大规模种植没有关联。去年，牙买加修正了其《危险药品法》。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做了几件事情。我们停止将拥有不足两盎司大麻定为刑事犯罪，将此定为可用开罚单来处理的轻微过失，而不是一种重罪。我们建立了一个法律制度来规范拉斯塔发里人在神圣仪式上使用大麻的行为。我们对这一种植物的医学、科学和治疗用途作出了规定。我们设立了一个国家权力机构来认证、规范和监测获准的用途。

在遵守禁毒公约所规定义务的同时，我们仍然认为，应允许各国灵活制定考虑到其他重要因素的适当法律和政策，这包括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以及我们公民的健康、福祉、人权、人的发展以及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我们认为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对大麻的定性是一个异常做法，一种物质的医学价值须由科学和基于证据的分析而不是由其他考量来确定。我们将继续遵守我们的国际义务，在我们同国际社会密切协作，研究制定平衡和创新的战略，以期从各个层面更好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时，也是如此。

关于本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牙买加再次呼吁建立一个机制，以便审查全球禁毒架构，并就如何最妥善地调整对世界毒品问题的认识和制定全球对策提出建议供会员国审议。

我们重申，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是我们共同和分担的责任。我们强调需要确保全系统一致性并加强麻醉药品委员会与包括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的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协作。

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力求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方面取得有意义和有效果的进展。我们必须将健康和人的发展摆在这一进程的核心位置。为了当代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切莫让他们失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禁毒专员玛尔雷娜·莫尔特勒女士发言。

莫尔特勒女士（德国）（以德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遭受贫困、犯罪和暴力之苦。尽管毒品不是造成这一困苦的唯一原因，但毒品起到了惊人的作用。

作为近几十年国际禁毒政策的成果，我们有什么可以展示？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走我们目前的路？

当然，我们需要有效的执法来控制贩毒、洗钱和腐败等现象。事实上，我们的机构必须在国际层面更好地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我们在这方面有共同立场。然而，单靠执法永远不能解决毒品问题。禁毒政策必须将人和公共卫生放在首位。

依赖性绝非道德堕落。这是一种疾病，一种能够治疗的疾病。治疗这种疾病能够取得好的结果。此外，这样做也符合人权。预防、提供咨询服务、减少伤害和替代治疗，这一方法在欧洲有极佳

记录。所取得的成功显而易见，那就是，犯罪率降低，艾滋病毒和肝炎患例减少。

禁毒政策要想符合实地现实，就必须规定合理的处罚。在纽约总部，让我们同意，只能根据适度规则来惩罚毒品犯罪。实际上，让我们更进一步，清楚表明死刑绝不可成为基于人权的禁毒政策的工具。

以人为本的预防、减少伤害和治疗努力是禁毒政策的支柱。另一方面的努力是惩治犯罪网络。然而，我坚信，我们的禁毒政策需要另一块基石：一项促进替代性发展战略的有效政策。有些人靠种植毒品作物维生和谋生，这些人需要真正、实际的替代手段。他们需要财政支助。他们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自助。因此，德国建立了一项称为“关于禁毒政策和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新方案。我们将在纽约总部向各代表团介绍该方案。

毒品毁灭生命，毁掉家庭，侵蚀社会结构，腐蚀整个国家。这一状况必须改变。让我们最终将人的健康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王国卫生、福利和体育事务大臣马丁·范莱恩先生阁下发言。

范莱恩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代表荷兰王国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担任欧洲联盟主席的荷兰完全赞同欧盟专员米米卡昨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所作的发言（见A/S-30/PV.1）。

我认为，本届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是一次独特机会，籍以反思我们于2009年承诺实现的各项目标和指标，并总结我们迄今所取得的进展。然而，我们也有责任展望2019年和2030年。

今天，同每天一样，我们会看到有20多万名儿童降生于这个世界，这20万名儿童依靠我们。我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们在一个没有影响他们福祉的吸毒和同毒品有关的犯罪的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然而，我还坚信，那些并不如此幸运的儿童至少应当有机会在不受偏见伤害和不受过度惩罚的情况下获得适当的治疗和护理。

我们来向前看。让我们与大会分享我们认为十分关键、能够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的禁毒政策的要素，荷兰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具有积极经验的要素，以及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要素。

近年来，与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强制性方法相比，全球禁毒政策显示出其稳定地向更加均衡的方法转变。必须强调，这不是不同方法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将不同方法以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每个国家都应当找到一种适合当地特殊挑战和情况的均衡方法。正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思普部长昨天清楚阐明的那样，这完全符合国际禁毒公约。各项公约使各国能够灵活采取治疗和康复等措施，作为对罪犯刑事制裁的替代或补充。

为禁毒政策而采取的均衡方法，还意味着对广泛的公共卫生方法进行讨论。重点关注吸毒者的权利和需求非常有效。通过循证预防方案，开始吸毒的人数将会减少；制订新的治疗方案，我们能够更好地治疗吸毒成瘾；提供减少风险和伤害的干预措施，我们能够更好地防止传染性疾病在吸毒者之间传播，同时还能保护我们的普通民众。现在是2016年，是时候承认减少风险和伤害的措施不仅是被证实能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病例增加的有效方式，还是保护我们各国社会的有效方式。让我们拥护此类干预措施。

因此，令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在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中，我们坚决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加强对国际禁毒政策的参与。我衷心感谢陈博士，她昨天在此发言，强调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感谢她致力于世卫组织在今后若干年发挥更大作用。她的发言让我相信，在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帮助下，今天是实现雄心勃勃

的2019年议程的第一步，减少伤害、预防和治疗是我们在该议程中关注的核心。

与此同时，我们必需继续努力解决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问题。我们应当重点关注有效执法政策的执行与合作，以解决非法毒品的生产、制造和贩运，包括洗钱和腐败问题。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需将资源用在刀刃上。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太过关注吸毒者、青少年及与吸毒有关的非暴力罪行。有组织犯罪才是更大的威胁。

第二，我要强调循证禁毒决策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真想实现对禁毒政策采取完善的循证方法这一远大理想，我们就必需抛开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目标。我们必需共同努力，继续奠定这样的证据基础，不断改进我们的干预措施。干预措施有时能奏效，有时却不能。这就是确立证据的方法：有尝试、有失误，有监督、有评估，还有分享最佳做法。让我们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我要强调，死刑不是循证干预措施。荷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反对适用死刑。昨天，在成果文件通过之后，欧盟观察员、欧盟成员国及其他28个观点一致国家发出了同样的明确信号。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时，必须适用对毒品相关罪行按罪量刑的原则。我们必需防止监狱过度拥挤，防止产生与它们有关的所有不利健康的后果。我请所有各方考虑采取替代措施，对与毒品有关的非暴力轻罪予以定罪或惩罚。

最后，本次特别会议的成果强调，要确保作为医疗和科学用途的管制药物不仅方便获取，而且负担的起，我对此表示欢迎。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对联合国公约过度严苛的解读、复杂的进出口规则，以及对于吸毒成瘾的恐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医院没有一些重要药物。这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呼吁本大会堂在座的各方兑现落在纸上的诺言，并确保迅速、深入地加以履行。

我们期待对于2019年及以后的公开、有意义的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秩序与南方发展部长Sagala Ratnayake先生阁下发言。

Ratnayake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最有现实意义的当代问题之一——世界毒品问题。我向主席和主席团成员以及齐聚大会堂的所有代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勇敢地承诺要解决毒品威胁，将毒品从我们的社会中彻底铲除。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认识到国内的毒品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现象；吸毒行为对吸毒者健康的不利影响；毒品相关犯罪的增加；人力、自然和财政资源的流失；以及吸毒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的破坏。

此外，我国政府完全认识到自身的国际义务，尤其是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规定的义务，所有这三项公约均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批准。斯里兰卡还指导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的谈判，并且是南盟公约的缔约方。

我国政府重申其有政治意愿并决心通过审查10多年前制订的现有国家政策，解决当地毒品问题，并且在国际上协助开展这项事业。我国政府管辖下的所有机构将必须遵守这项国家政策。相关的非政府机构将会成为积极执行国家政策的伙伴。在这项政策框架内，私营部门机构履行社会职责，对于毒品预防和控制也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在毒品问题方面的总体目标十分远大：到2020年，将毒品供应和吸毒减少到最低水平。所有禁毒执法机构和直接参与减少毒品需求的政府机构，包括省级和地方行政部门，以及可能有助于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机构共同实现最终目标的其他机构，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政府将在人类发展的背景下，对药物滥用管制采取更加宽泛的做法，尤其侧重于药物滥用、

减少贫穷、预防犯罪和改善健康之间的联系。我国政府认为，解决毒品问题最行之有效的做法将构成一项综合、均衡和协调一致的战略。在这样一项战略中，供应管制与需求减少将相辅相成。高度的共同责任感将成为常态。

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机构将参与执行毒品管制战略，其中包括有效执行打击非法毒品生产、走私、贩运、销售和使用的法律；有效执行管制毒品和前体化学品的受控进口、出口和销售；预防吸毒并减少药物滥用的不利后果；以及支持与预防和管制药物滥用有关的区域和国际举措。

斯里兰卡前体管制局对23种已确定对经济发展大有帮助的前体化学品实施管制。这使得能够防止这些化学品被用于非法生产精神药物。前体管制局对前体化学品的进口、运输、分销、储存和使用进行监测，并对开展此类活动的场所实施监管。

此外，我们还重视减少滥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行为，这已被确认为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最近，我们查获110千克通过海路贩运的海洛因，数个国家的国民涉及此案，此举凸显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执法决心。

斯里兰卡政府为建立一个分享毒品贩运情报的中心采取了初步步骤，其目的是增强国家机构的能力，使之能在南亚和东南亚区域传播准确的信息。

此外，政府采用公众接受的甄别和评估方法——由本国的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和私人机构实施，为吸毒者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我们还就治疗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了必要的法律，该法律除其它外，授权司法当局责令毒犯在国家机构或得到承认的私人机构接受治疗，以代替惩罚。

政府采用有据可循的做法，从社会和科学角度研究毒品和精神药物，通过对研究结果进行有效分析，努力实现减少和完全消除毒品的目标。政府在全国各地提供有效干预治疗所需的外联服务、后续护理和康复服务，尤其将未参加住院治疗方案的治疗对象作为服务重点。

斯里兰卡强调，必须采用医疗和心理治疗手段，并保障受吸毒有害后果影响的儿童、妇女和青年等特定社会群体的福祉。

最后，我谨向大会保证，斯里兰卡将继续致力于为各种国际努力提供最充分的合作，以遏制世界毒品问题，这个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可能会破坏我们各国社会的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捷克共和国卫生部长斯瓦托普卢克•涅麦切克先生阁下发言。

涅麦切克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代表捷克共和国在本次历史性会议上发言。这使我和我国感到荣幸。我国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S-30/PV.1）。

我们之所以汇聚于此，是因为对我们兑现我们2009年所作承诺的能力深感关切。同时，我们的会议开得正是时候，正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反映我们应对全球毒品问题努力的进展情况。请允许我简短地提请大会注意约翰•霍普金斯-柳叶刀毒品政策与健康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柳叶刀》是全世界最有威望的两家医学期刊之一。该报告不容置疑地表明，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国际毒品政策已遭遇明显的失败。我们的努力意在保护人民，但却以取缔和刑罪化为基础，对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造成有害影响。禁毒斗争加剧了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并使致命的过剂量使用行为在吸毒者中更加盛行。强制取缔毒品加剧所有这些风险，不仅使毒品使用者而且还使全体公民都受到影响。在受管制药品、特别是阿片类药物和医用大麻方面针对全球大多数人口的实际禁令也造成同样的后果。

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那么我们必定重蹈覆辙。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的数个部分普遍存在否认证据的内

容。荒谬的是，事实证明，在受毒品政策不良后果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在否认这些证据方面最为起劲。

捷克共和国赞同本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因为我们坚信，本次辩论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维持全球毒品管制机制，那么我们必须继续不间断地进行这一讨论，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于2019年前找到非常具体的措施。

因此，捷克共和国全力支持欧洲联盟呼吁加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它联合国实体——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协调。我们还希望进一步提高对毒品形势科学监测的质量，并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捷克共和国能够并将利用其本国经验，展示基于公开讨论和科学证据、注重人权的药物政策在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方面带来的益处。我们坚信，为人订立的药物政策应当首先为人着想，而不是毒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司法部长玛丽亚·埃斯特尔·雷乌斯·冈萨雷斯女士阁下发言。

雷乌斯·冈萨雷斯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大家怀着很高的期望前来参加本届特别会议，希望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可怕的世界毒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远未减轻，反而正在恶化，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未能依照2009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要求，减少毒品需求、生产和贩运，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感到担忧？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至少有2.46亿人吸食非法毒品，在获知这一点时，怎能不感到担忧？

毒品这一祸害已蔓延至所有地理区域。它导致并延续贫困、暴力、各种犯罪行为、社会排斥和健康状况受损的循环。如果不能消除主要来自北方的毒品需求，那么，解决与南方大规模毒品生产与贩运有关的问题将很困难。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承认并执行共同和分担的责任这一原则。如果各国继续采取军事化做法——袭击农民，不尊重它国主权，而且无视各区域的特殊情况，那么，这个祸害将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

不论是使毒品合法化，还是将毒品作为无害物质对待，都无法消除这一祸害。将其中任何一种做法视为解决之道，都无异于承认各国无法或不会履行其打击犯罪和保护本国公民健康的义务。正因如此，古巴不赞成此种做法。它会使我们各国的稳定出现危险的漏洞，并对其它同样复杂的跨国犯罪造成影响。

一概而论，坚称在毒品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这一祸害发展至当前规模的原因，这是不公平的。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包括在一些国家和区域是如何解释和落实禁毒政策的。

还必须处理问题的根源，在这方面不要忘记一个不公正、自我中心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影响和一个在全球范围强制推行、唯利是图的腐败力量盛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影响。这些因素是毒品问题及其它相关祸患的根本滋生土壤。

有经验显示，当国家制定、落实和领导实施全面的预防性教育政策时，就有可能有效打击毒品。社会包容、社区参与、普及治疗及康复服务，同时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再加上针对犯罪的严厉立场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使得上述可能性更有增加。通过坚持这些原则，再做出重大努力，我国得以防止非法药物的生产、贩运和使用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同样，我们防止我国成为毒品贩运和相关犯罪的平台。古巴革命虽说没有充足的资源并且是在严厉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下进行的，但在处理毒品方面一直很成功，这是因为政府的强大政治意愿和人民的支持。

现在应当重申各国及其它行为体对毒品控制国际法律框架的政治承诺，三项国际禁毒公约是此种

框架的基石。我们重申我们对反映了恰当的全球共识的S-30/1号决议的支持，并重申我们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各位领导人有关毒品问题的发言的承诺。

我要在发言的最后重申，古巴绝对致力于实现没有非法毒品的社会，这对于实现各国人民的可持续发展及福祉至关重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喀麦隆共和国外交部长Lejeune Mbella Mbella先生阁下发言。

Mbella Mbella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喀麦隆欢迎召开本次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毒品问题仍然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

我热烈祝贺吕克托夫特先生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当选，并祝愿他们主持我们的工作一切顺利。

值此之际，我还要赞扬麻醉药品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开展了筹备工作，他们的工作应当使我们得以在本次会议上审议在落实2009年通过的《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迄今，根据上述文件，肯定取得了进展，但显然仍需克服诸多障碍，特别是减少供需问题，这一问题是世界毒品问题的主要根源及后果。其在健康、人权、经济、司法和安全等领域的影响是我们各国严重关切的问题。

喀麦隆与多数国家一样，面临毒品生产、贩运和吸毒这一不断泛滥的现象，不幸的是，年轻人是主要受害者。15000多名15到25岁的年轻人经常吸食大麻。我国对该局面采取了强有力的对策。我国是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及几乎所有构成国际毒品控制制度基础的相关国际文书的缔约方，本次会议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重申了这一点。

此外，喀麦隆通过了一项多部门国家战略，注重提高认识和社区动员，以预防毒瘾，主要规定措施包括：组织讲习班，提高认识和建设社区领袖的能力，加强包括各协会及非政府组织和公私媒体机构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参与和参加；制作提高对预防和打击毒瘾认识的材料；组织举行教育类谈话；放映主要关注最为弱势人群的影片及纪录片；以及将禁毒主题方案纳入学校课程。此外，在机构建设领域，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预防中心，主要目标是减少吸食新毒品现象。

喀麦隆当局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刑事犯罪问题，而且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们特别重视预防及护理，重视对受影响人员的治疗及管理，重视家庭内发生毒瘾现象，以及重视医院及保健中心的建设。在这方面，卫生部长2015年4月签署了一项关于保健、支助和预防毒瘾中心的建立、组织和运作的法令。还在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协调下，举行了参与打击毒品及加强法律及公共机构的不同部委和机构之间的协商会议。在喀麦隆两个主要国际机场安装毒品控制装置也增强了对这一祸患的监控，并反映出我国政府切实打击毒品现象的决心。

我们再怎么说也不够：毒品问题的程度与严重性证明其具有贯穿各领域的性质。毒品问题是影响各大陆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因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相关联而使其更趋复杂，此类团体成员、尤其是我国正严厉打击的“博科圣地”组织的自杀式炸弹手频繁使用毒品就证明了这一点。为此，必须做出全球应对。因此，国际合作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需要技术与资金援助的优先需求。此外，还要根据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提高那些需要援助国家的能力，以便处理毒品问题。

只有通过在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各级协调一致地努力，并且分享经验与最佳做法，打击该现象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

副主席阿布德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主持会议。

在这方面，喀麦隆愿再次承诺继续加大预防和管理措施的力度，以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并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非洲联盟等各国与各伙伴一道努力，以找到持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本着这种精神，喀麦隆建议，在采取本次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时，应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就打击毒品问题召开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次区域会议。

我们欢迎协商一致通过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这项新文书将大大推动我们共同打击该全球祸患的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纳共和国外交与区域一体化部长Hannah Serwaa Tetteh女士阁下发言。

Tetteh女士（加纳）（*以英语发言*）：我向大会致以加纳共和国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先生阁下和加纳人民的热情问候。我荣幸地代表加纳政府发言，并与其它代表团一道表示，认可并支持在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伊始通过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该文件不仅表达了我们对有效处理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联合承诺，而且还为我们今后继续介入以有效应对全球各地依然存在的各种重大挑战奠定了基础。

对加纳来说，本届特别会议提供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它为重新思考全球控制毒品战略提供了空间。第二，它为采用和加强在2009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所制订的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禁毒政策提供空间。

该成果文件的谈判与制订是一个颇具建设性的过程，它协助确立了当代禁毒政策与公共健康、刑事司法、发展以及人权之间的重要关系，而所有这些都是制订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统筹和均衡战略的关键因素。

作为该审查进程的成果之一，加纳希望看到在各项国际禁毒政策执行中的灵活性不被视为无原则放任自流的加密近义词。必须把灵活性视为联合国内部制订集体禁毒政策进程的一个核心部分。制订这种集体政策还必须基于更详细和更全面地分析会员国和其它利益攸关方认为在禁毒政策治理与干预中可行的做法。换言之，灵活性必须基于有原则的多元化。

与许多其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加纳也对用于姑息护理的类鸦片不足表示关切。据估计，按照目前的吗啡供给量，加纳近90%的癌症和艾滋病患者无法得到充分治疗。我们呼吁各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与我们结成伙伴，把有效镇痛和姑息护理纳入公共健康系统，以便确保可获取用于医学和科学用途的受管制药物，同时防止其转用。

加纳政府致力于确保那些依赖毒品的人被纳入公共健康系统而不是刑事司法系统。他们需要公共健康方面的支持，而不需要刑事措施。必须把公共健康与人权做法纳入药物管制工作。我们必须确保在药物管制工作中为基于健康与人权的做法分配更多的资源。

根据这种做法，加纳政府倡导在联合国系统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毒品贩运问题工作队的毒品问题方案拟订中制订一项有关保护人权的全系统政策。我们认为，这将自然导致强化和落实现有的联合国人权尽责工作与政策。

我们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将在当前就可持续发展目标3.5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就药物管制指标进行的讨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开发新的支持发展的图表，以协助拟订下一项政治宣言。

我们还呼吁成立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高级别独立专家委员会，以分析全球获取受管制药物的状况，并就改进措施提出建议。制订联合国全系统在治疗用药混乱方案拟订方面连贯一致的指导方针，以适用于联合国的各种方案拟订，也值得在本届会议上加以审议。

我们支持建立一个适当的论坛，以鼓励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分享在禁毒刑事司法应对干预政策及其结果方面一系列广泛有力的科学证据。这应为2019年通过任何新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提供信息。

最后，本届特别会议应设立一个禁毒政策问题开放工作组，以编写可衡量的全球禁毒政策目标供2019年通过。我们认为，该工作组的总部应设在纽约，在2019年到来之前的时期内开展工作，并向大会提出其建议。工作组的报告应充分涵盖在禁毒斗争中保护人权方面的指导方针。

最后，加纳期待继续努力提高迄今已开展的对话质量并加深这种对话，以便在调整国际禁毒政策的重心时更多地强调健康和人权，包括治疗、护理以及减少危害与风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多哥共和国国家禁毒委员会执行秘书Kossi Baoumodom Amayi先生阁下发言。

Amayi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感谢得到这个机会，向大会介绍我国多哥在打击毒品方面采取的多层面行动。尽管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存在了几百年，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会赞同的是，国际社会只是在过去50年才切实和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协调办法打击这一祸害。

不幸的是，与西非沿岸其它国家一样，多哥处在从南美国家向欧洲贩运毒品的路线上，就我国而言主要是可卡因。这种情况要求我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方面，多哥已批准有关打击毒品的联合国所有公约和条约。

1996年，由于认识到贩运毒品构成的危险，多哥设立了国家禁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跨部委机构，负责禁毒政策。1998年，毒品管制法获得通过。在建立决策机构之后通过了行动措施，其结果是设立了中央反非法药物贩运和洗钱局。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哥与其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破裂，这些措施经受了考验。犯罪网络借助合作方面的真空，逐步在多哥落地生根。但是，无论任何时候，多哥政府都没有放弃过这场斗争。例如，2004年，我们在洛美截获了“Pitéa”号货船，船上载有约400公斤可卡因。

自2005年以来，得益于多哥政府采取的行动和国际合作，禁毒斗争重新展现出活力。因此，我们在2008年粉碎了盘踞在我国的南美贩毒网络。打击毒品贩运是我国政府的一大要务。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我国境内各个地区截获的毒品。不过，近年来截获的硬性毒品数量不多，原因可能是毒贩现已选择其它路线。

多哥自2009年6月起废除了死刑。尽管在此之前存在死刑，但我们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则是1979年。虽然确实仅靠打压无法战胜毒品贸易现象，但是，多哥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行动，以便减少需求。

治疗吸毒成瘾者仍是多哥卫生方面的一个优先事项。在洛美大学医院下设了一个戒毒治疗中心，此外还设立了另外两个心理治疗中心，以便治疗成瘾者。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培训的行为体在我国社会各阶层开展提高意识活动。我谨借此机会赞扬挪威王国和许多其它合作方，它们的合作加强了我国的减少需求活动。

毫无疑问，世界毒品问题妨碍我们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做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多哥继续坚定致力于在区域和国际一级打击毒品祸害。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国期望确保加强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便战胜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的毒品问题。应特别关注最脆弱国家。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国完全支持非洲联盟共同立场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发言。

布迪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主席当选主持本次非常重要会议的工作。

本次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通过了S-30/1号决议，由此成为一个里程碑。印度尼西亚欢迎通过这项决议，如果参加谈判进程的会员国没有展现协商一致精神和高度灵活性，我们原本无法取得这一成就。

通过2009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已有七年。尽管我们做出了积极努力，并且开展协作，但世界毒品问题仍然存在。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认识到，本届特别会议十分重要，它是我们走向2019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高级别论坛。我们认为，本次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供会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讨论在执行2009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因此，本次特别会议及其S-30/1号决议应作为重要的一步，按照三项国际禁毒公约，推动实现《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列述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

基于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内容，请允许我谈几点主要意见，这些意见表明了我国对世界毒品问题所持立场，也反映我们为求实现一个无吸毒现象社会的目标，为应对和打击毒祸作出的努力。

第一，印度尼西亚重申，三项国际禁毒公约是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基石。

第二，减少需求措施仍是我国药物管制战略的组成部分。印度尼西亚继续制定战略，以便改善我们的戒毒康复方案，特别是建立更多禁毒中心，包括基于社区的自愿戒毒中心。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表明，家庭和社区积极参与各级预防工作十分重要，此外，采取措施铲除滥用药物和精神药物现象也很重要。

第三，毒品贩运的当前态势仍是一个严重威胁，需要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贩毒集团的作案手法复杂缜密，例如更普遍地提供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或者使用互联网，它们继续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地区蔓延，并且渗透到社会各界，包括青年当中。与贩毒所得相关的洗钱活动是另一个重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严重犯罪，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严厉但适当的执法措施，以便对毒贩和涉毒犯罪人员所犯罪行追究责任。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毫无疑问，非法麻醉药品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并且对健康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国情。不应认为在一个国家适用的做法可以自动照搬到所有地方，任何人也不应把本国在解决药物滥用问题方面的失败推而广之，认为是每个国家在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的失败。

我们认为，也应当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按照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处理毒品贩运构成的跨国挑战。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拥有在考虑到其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和规范的情况下，决定以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毒品问题的主权和责任。

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毒品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完全赞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共同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抑制和消除毒品的祸害，需要采取零容忍的方法，以便为区域人民和社区提供一个没有滥用毒品及其不良影响的社会。

第四，印度尼西亚非常重视提倡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在处理毒品问题时，我们认为，应当以非歧视性的方式向所有人提供卫生设施、保健和社会服务，同时考虑到妇女与儿童的特殊需求。但是，我们认为，应当以平衡的方式促进和保护人权。

尊重人权必须意味着保护个人的权利，包括保护弱势个人免遭罪犯的掠夺。因此，我们认为，应

当把涉毒罪行的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权利当作制定全球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查尔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是进一步讨论如何以全面和可持续的方式处理世界毒品问题，以及如何协调为解决这一国际危害所作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努力的一个及时和重要的渠道。就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受到非法贩毒、非法使用毒品和相关后果困扰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选择这一时刻召开特别会议是非常合适的。

在一些地方，有人仍然认为，那些试图遏制人们参与非法毒品贸易的强有力的惩罚性法律能够减少世界毒品问题及其相关的健康和社会危害。但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坚信，不能够再依赖专注于缉获、逮捕和惩罚的战略和政策来解决严重和有害的毒品问题。因此，我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支持从这种老旧的方法转向新的方法，采用并注重一种平衡、综合和多学科的处理该问题的方法。

此外，我们提议，应当把资源集中用于减少涉毒犯罪，同时有效处理吸毒受害者面临的吸毒和药物依赖的有害健康、社会和经济后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强调，必须及时和可靠地收集数据，以便准确评估国内的现状并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按照关于毒品问题的国际文书，呼吁我们的伙伴继续按照这些国际法律文书的设想，与我们一道携手努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支持执行一个严格的药物监测信息系统，并制定积极的战略，使各国能够迅速识别新的威胁，同时预测其对我们社会的潜在影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毒品政策和毒品管制业务计划，谋求以平衡和多管齐下的方法，按照地方、区域和全球标准来处理毒品管制的复杂问题，这些标准已经做了调整，以适合我们的国情。我国早就批准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并且也已把它写进我们旨在解决并最终根除有害的毒品问题的战略。

世界毒品问题对公共卫生以及全人类的安全与福祉构成了严重挑战。认识到这个数十年之久、在某些情况下数百年之久的问题，包括药物依赖，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已批准以公共卫生方法来管制毒品，不仅防止毒品的使用，而且还减少了它对我们所有公民、包括婴儿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必须以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支持国家一级的努力。我们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必须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巩固毒品管制环境的框架，一段时间以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直要求这样做。

我们的国家毒品政策还提倡作出努力，加强替代发展方案，帮助为最容易涉毒的群体提供过上健康和富有成效生活的包容性机会，其中包括妇女、青年、残疾者、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和其他高危人群。此外，我们认为，替代发展必须兼顾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充当中转站的国家以及消费市场的特殊情况，并且这种方法必须汇集那些有助于民众，尤其是最容易涉毒的群体，接受和采纳健康生活方式的举措。

我们的禁毒方案还必须寻求增强个人权能，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具备生活技能，旨在抑制吸毒和参与有害毒品贸易等行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敦促今天在此聚会的诸位对同禁毒有关的替代发展采取更宽泛的看法，更加注重应对引起和助长国际毒品问题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如果负荷过重，既定政策的效力就会受到损害。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张加强刑事司法系统，以便采取恢复性司法办法来代替监禁，这种办法将适用于贩毒行为及其相关犯罪活动以及吸毒行为，其目标是缓解监狱人满为患、未成年人因涉毒犯罪而被关押者比例过高、刑事司法系统出现严重拖延以及对候审或被羁押人员的改造或职业培训不足等问题构成的重大挑战。

各国确保医疗保健系统获得成功运作不可或缺的药品的机会、制约获得受管制物质的机会和限制非法使用药品现象的努力，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禁毒政策促进采取科学办法，制定有效的减少需求和供给战略。我们还认为，国家和全球层面各相关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能够成为防止管制物质被转用，同时确保医疗保健设施有充足资源的有效机制。

最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兴地加入了关于本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的协商一致意见。然而，我们希望，未来关于诸如这一重大世界毒品问题的至关重要议题的成果文件的谈判在纽约进行，因为在这里，所有会员国都能有大量人员参加，而在其他地方，则并非所有会员国都派驻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如既往，仍然致力于继续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和执行针对性强而且灵活的政策，这种政策对于全方位消除安全关切以及非法毒品贸易给我们各国社会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第一副部长马拉特·德米沃夫先生发言。

德米沃夫先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欢迎本届特别会议各位与会者，并祝大家工作顺利。

毒品威胁及其给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这一议题在国际议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令我们持续感到关切。我们认真对待这一威胁。我们在国家层面采取了一些坚定措施来打击贩毒行为。这是我们对内和对外政策中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我们的哈萨克斯坦2030年战略以及一系列其他国家和相关方案也处理这一问题。

毒品构成的威胁具有跨国性质，而且不断变化，这无疑要求我们采取协调和积极的联合措施。哈萨克斯坦表示，我们致力于参加旨在应对毒品威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我们高度赞扬并全力支持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独立国家联合体各禁毒机构、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组织在内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相关举措和努力。

堪当此类合作典范的机制之一是位于阿拉木图的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我们要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捐助方和伙伴国表示感谢，它们致力于担负起责任，向该区域中心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我们确信，该区域中心在禁毒方面将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努力作出贡献。我们还正在积极努力设立一个国家机构来提供技术援助。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生在宣布他的方案宣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时，再次强调了制定一项关于2045年全球战略倡议的计划的重要性。该计划将旨在造就一个以所有国家都有公平机会利用基础设施、资源和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趋势。这将对处理非法毒品贸易具有重大影响。我们还支持以人道主义方式对待吸毒者的措施。我们坚信，在这方面有必要采取非常谨慎和平衡的办法。

毒品生产的增长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广泛流行对我们减少鸦片和大麻生产的努力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认为，目前局势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反应，并要求加强区域间合作。哈萨克斯坦重申其对三项国际禁毒公约各项目标的承诺。我们表示，我们愿继续作出协调努力，旨在打击毒品贸易。

哈萨克斯坦作为本届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坚持要求通过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它提出了一项打击麻醉品非法贸易的战略。它还是朝着加强应对这一威胁的措施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部际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丁比·诺埃尔松·哈马先生发言。

哈马先生（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马达加斯加赞同南非代表以非洲联盟各国的名义、苏丹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以及摩洛哥代表以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S-30/PV.2）。

毒品问题不仅是一个同卫生有关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安全。尽管马达加斯加政府资源有限，但我们一贯表明，我们愿意大量投资于禁毒努力。

的确，我国在加入三项国际禁毒公约之后，设立了一个国家机构，即打击毒品部际协调委员会。我国政府一名代表受托界定、编制、管理和协调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全国毒品管理政策。

在国家一级，马达加斯加通过了关于马达加斯加管制毒品、精神药物和前体的第97-039号法。但可悲的现实是，在过去几年中，随着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不断，毒品的贩运和消费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愈来愈多的消费。大麻仍然是主要的消费毒品，而且一直在助长马达加斯加的非法贸易。

我国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我国一个主要的关注问题是找到所有的非法麻醉药品作物并予以摧毁，并代之以可行的作物，更具体地说，替代作物。为保护一直受到毒品威胁的公众健康，提高了预防活动的力度。当前各项措施的基础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制定的关于预防毒品消费的国际准则。

至于相关问题，我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洗钱、排查、充公和关于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的法律。为了应对洗钱问题，我们一直在分享金融情报。为了建立一项就近政策，设置了关于咨询和医疗的在线培训材料，参加者来自马达加斯加若干地区；其他的仍在组织过程中。在这方面，2016年一个联合会正在各部提供免费咨询课程。马达加斯加参加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两份补充议定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采取的某些措施。

参与打击毒品的每一个人都齐心协力，确保减少毒品的供求。借助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我国政府在过去连续四年得以为我们工作在这个领域内的多数利益攸关者提供能力建设培训方案。2015年，对塔那那利佛市区中学的吸毒程度进行了调查。

2004年，我们采取了一项毒品管制总计划。由于现实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该计划需要更新 – 尤其是一些国家鉴于注射吸毒会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因而威胁公共健康，在它们的禁毒行动计划中加入了减少风险的内容。我们的主要关注之一还有，提升毒品管制法以及关于前体和精神药物的法律。

最后，马达加斯加随时准备打击毒品贩运。但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利于政府有效处理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愿为我国的至高利益和回击世界毒品问题尽一切所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公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自从我们聚会纽约，着手 – 在2008年以前，不折不扣 – 实现无毒品世界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八年。我们集体的失败是明显的。没有一个国家无毒品，多年来非法药物使用居高不下。所以这次特别会议给我们一个机会，进行反思，并质疑我们过去的思路，因为它显然没有如愿产生结果。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目标。国际毒品管制框架的目的是处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卫生保健却不是首要问题。每年有1，000亿美元用于全球缉毒，主要是减少供应而不是需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2015年世界毒品报告》发现，当前毒品政策

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宝贵的资源从公共卫生向执法分流。当前体制促进了有厚利可图的，暴力犯罪的黑市，而且将吸毒者入刑和边际化。这些并不是次要的副作用。

妇女受其影响尤甚。她们缺少经济机会，增加了她们被推入非法毒品交易的风险，在处于政治动荡中的国家尤其如此。毒品网络往往也涉足性贩卖。不仅如此，国内毒品政策，尤其是在执法领域，往往缺乏对性别敏感的方式。

我们还对继续向涉毒罪施以死刑深感震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估计，当前有33个国家和领土实行死刑，有些国家实行强制死刑。涉毒罪并未达到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门栏。因此，相关的处决明显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我们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停止这种没有遏制作用的做法。

我们只有立即开始改弦更张，这次会议才堪称特别。我们必须以人权和科学证据为基础，把健康和福祉放在我们工作的中心。特别要在预防、减少伤害、提供治疗和吸毒者重新融入社会方面下功夫。我们必须帮他们找到有意义的替代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中，我们承诺加强预防药物滥用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议程》是建立在人权和人的尊严基础上的。我们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回应也必然如此。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共和国助理国务兼卫生秘书费尔南多·阿劳霍先生阁下发言。

阿劳霍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我们还谨对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S-30/1号决议，附件）的成果文件获得通过表示赞赏。这是在关于如何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辩论中向前迈出的一步，并为2019年目标日期之前及之后提供了坚实的投入。

葡萄牙认为，本届特别会议进程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承认必须重新平衡毒品政策，使之趋于基于人权和公众健康的做法。葡萄牙对待毒品的方式被认为是最佳做法的范例，因为我们认识到，吸毒是一个健康问题，对毒品的依赖是一个可治愈的多因素慢性疾病，它需要的是治疗，而非惩罚。在葡萄牙，去罪化创造了一个法律框架，以执行旨在减少吸毒造成的危害以及指引吸毒者接受最合适治疗的政策。即使吸毒者无法戒毒，我们认为，他们仍值得政府为改善其健康和社会处境进行必要的投资。

因此，去罪化是一种全面减少毒品需求办法的一部分，它包括预防、治疗、减轻伤害和回归社会。执行循证减轻伤害的措施被认为是我们政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此类措施改善了吸毒者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祉，为吸毒者甚至整个社会提供了保护。因此，重视减少风险和伤害的办法，是葡萄牙坚持的一个关键原则，因为此类措施已证明其有效性，应予进一步提倡和实施。

葡萄牙重申对三项主要国际禁毒公约的承诺，我们认为，这些公约为各国在确凿的科学证据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优先目标和特点，制定和执行毒品政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弹性。在这方面，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已在数个场合指出，这些公约并未要求将使用毒品行为入罪，葡萄牙的去罪化模式与这些公约相一致。

葡萄牙坚信，我们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努力必须纳入人权视角。在这方面，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成果文件没有涉及废除死刑。我谨强调，葡萄牙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情况下的死刑，包括对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使用死刑。因此，我们呼吁保留死刑的各国立即正式暂停死刑，以期将其永久废除。

最后，葡萄牙坚信，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全面解决毒品问题。我谨向主席保证，我国将继续在这一努力中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2002年11月19日的大会第57/32号决议，我现在请各国议会联盟观察员发言。

Patricia Torsney女士（各国议会联盟）（*以英语发言*）：议员是毒品政策影响的最初见证者之一。他们与自己的选民互动，有的选民担心其孩子面临风险，有的质问得不到治疗的原因，有的要求得到法律服务以免受到起诉，还有的选民仅仅需要有人倾听其关切。议员直接参与制定管制本国毒品的法律框架和法规，而且他们负责批准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康复的预算，帮助遏制毒品的影响。

今年2月，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为筹备本届特别会议联合举办了一次议会听证会。这次听证会以几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关于毒品问题的讨论为基础，因为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政策的影响。这次听证会表明，毒品成瘾与其它瘾疾——如酗酒和抽烟成瘾——之间没有很大差别；毒品不尽相同，吸毒者并非都上瘾。

出于这些原因和许多其它原因，议员们认为，世界对毒品问题的对策必须有同情心，且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它必须首先在不辱没和歧视吸毒行为的情况下，将之视为一个健康问题。尽管在数个议程项目上没有达成共识，这次听证会处理了许多误解，为在各国议会中开展进一步的政治辩论奠定了基础。这次听证会显示，在四个关键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一，三项主要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为所有各国提供了一个指导政策的框架，各国不应试图独自行事。

第二，不少国家过于狭隘地诠释这些公约，未虑及其灵活性。根据这些公约，虽然生产、销售和使用毒品依然必定是非法的，但是，惩罚违法者并不要求采用监禁方式。许多议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各国应更加重视解决吸毒问题的根源，而不仅是其影响。如果人们在帮助下脱贫；如果他们能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机构更加透明；而且如果他们的代表积极主动落实各项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毒品问题的肇因将被削弱。

第四，必须更加关注所称的禁毒斗争带来的意外后果，包括利润丰厚的毒品市场的扩张及其相关的犯罪活动。许多与会者对以牺牲预防和治疗为代价将大量资源用于执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并对一味盯着小规模的生产者和使用者，而不是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大规模的卡特尔这种做法表示关切。正如一名议员所指出，禁毒斗争已成为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这正是旨在减贫、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我们予以紧急纠正的一个意外后果。

毒品政策必须尊重人权，包括土著人民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毒品使用者接受治疗的权利，当然还有所有权利中最神圣的生命权。数名与会者强烈反对对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使用死刑。

这次议会听证会揭示，必须以更连贯的国家政策来取代不少国家这些年来在立法和措施方面采取的修修补补的做法。所有各国应全面审议本国的毒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所有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协商，制定一项综合、平衡的战略。这一问题必须继续在全球和各国议程上位居前列，尤其是对于议员们而言。尽管很多人对现有法律框架和迄今在该问题上的总体对策感到满意，但是，很多其他人对此并不满意。我们必须认真倾听人们对全球毒品问题对策效果不彰日益增加的关切。我们必须根据事实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理想化的世界图景制定政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94年10月19日的第49/2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观察员发言。

巴拉先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给我这次机会，代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向大会发言。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网络，包括190个成员国协会，并通过7000万社区志

愿者开展工作。我们的使命是防止或减轻一切形式的人类痛苦。正如克劳得·奥利文斯坦教授在其《没有幸福的吸毒者》一书中指出，吸毒无疑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如此，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数十年来一直大声呼吁关注吸毒的不良后果，从1922年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区域会议开始——当时正盛行吸食鸦片——直到今天。

我们是最先呼吁对吸毒者采取人性化的循证减轻伤害政策的国际组织之一，这一政策如今正由许多与公共当局合作的国家协会在世界各地付诸实践。在对待吸毒问题上，我们一直对仅仅依靠起诉和惩罚吸毒成瘾者，同时忽视支助、护理和治疗的做法所引起的人道主义后果深感关切。关于这一问题的公众健康研究结果非常清楚。更加人性化的做法在防止吸毒的最严重后果方面效果只会好得多。

在我1976年创立的位于罗马的意大利红十字/Villa Maraini基金会这一机构中，我接触过约4万名吸毒者。作为这样的一名医生，我个人可以证明，对吸毒者的压制态度不符合公众利益，而且我们应努力接触生活隐秘、难以接近的人群。“接触和治疗”应当是我们的口号。

依赖毒品的人依然是世界上最弱势、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然而，太多的情形是，吸毒者不仅没有得到理解及得到治疗和护理的同等机会，反而继续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们在社会上遭到侮辱，受到惩罚并被投入监狱，而不是得到治疗。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妇女和年轻人尤其脆弱。接纳使用毒品者并向其伸出援手，而不是拒绝他们，这种做法符合我们每个人的利益。解决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是实现赋权和恢复的重要一步。赋权始终有助于治疗。如果存在真正的政治意愿，采取此类做法并非不可能。我们需要一种重视吸毒者健康挑战和需求的不一样的做法。

今天，我们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藉以呼吁采取确保人们有公平机会获得医疗保健的政策。因此，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执行有效、以人为本和包容性的措施，以减少健康风险。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昨日恰当地指出（见A/S-30/PV.1），科学证据明白无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加以兼顾。就其本身而言，凭借在难以接近的社群中现有的庞大志愿者网络，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有条件加强其与地方当局、社区一级的其它利益攸关方、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弭平正规卫生机构与最边缘化人群之间的现有鸿沟，并真正确保不遗漏任何人。

下午1时05分散会。